

從「國史大綱」看錢穆的史學造詣

陳 豐 祥

一、前 言

錢穆所撰「國史大綱」出版於民國二十九年六月，迄今已滿四十寒暑。四十年來，新作品固然不斷問世，但不旋踵間驟起驟落者，多如過江之鯽，能夠歷經時代嚴格考驗而不消沉淘汰者，實寥寥無幾。而「國史大綱」於此數十年間，地位始終屹立不搖，在台發行亦已十餘版，且屢經史界前輩推荐，作為後進治史入門書籍，可知其價值久經士林同道所肯定，故能長享盛名，迄今不衰。本文即擬探討該書之創作背景及主旨，以了解錢穆之史學造詣及其盛名不衰之所在。

二、新史學發展下的通史創作

民國以來，新史學研究的成果，已逐漸使此一學術走上學院化、專業化及獨立化之道路⁽¹⁾，而促使新史學進步發展的主因是世變，「世變愈急，則史學變得愈快；世變愈大，則史學變得愈新⁽²⁾」。清末民初的中國在內憂外患交相侵逼之下，正是急劇轉變的時代，新觀念、新思潮、新價值觀都應時而生，歷史研究不得不隨之轉移方向與內容。這種情況正如美國史家魯賓遜（Robison）所說的：「我們決不能用舊眼光來看新問題，或是用舊理論來解決新問題，歷史不是一種停頓不進的學問……歷史的觀念同目的應該跟著社會科學同時變更⁽³⁾」。錢穆亦曾評論吾國史書「乘一時

(1) 汪榮祖：「五四與民國史學之發展」，參閱汪榮祖編：「五四研究論文集」，頁二二一，聯經出版社。

(2) 沈剛伯：「史學與世變」，頁二，大林出版社。

(3) 魯賓遜原著，何炳松譯：「新史學」，譯者導言，頁二，文星書店，民國五十四年初版。

代之新需要而創造新體裁者不勝縷舉，要之自尚書下逮通志，此皆有志於全史整面之敘述，今觀其相互間體裁之不同，與夫內容之差別，可知中國舊史固不斷在改寫之中⁽⁴⁾」。

因此，當代中國史家，爲了具有新眼光與新理論來解決當前的新問題，一面承襲乾嘉考據訓話之學，一面採納西洋史學理論與治史方法，於是學派紛起，蔚成百家爭鳴的盛況。大體而言，民初新史學之主要成就，正如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所指出的，具有兩個特徵：一爲客觀的資料整理，一爲主觀的觀念革新。但求一能融合資料與觀念，並能「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撰著，實不多見。故錢穆慨乎以爲是史學的末運衰世，其言云：

「自南宋以來又七百年，乃獨無繼續改寫之新史書出現，……今則爲中國有史以來未有的變動激烈之時代，其需要新史之創寫尤亟，而適承七百年來史學衰微之末運，因此國人對於國史之認識，乃愈昏昧無準則。前述記誦、考訂、宣傳諸派，乃亦無一能發願爲國史撰一新本者，則甚矣史學之不振也⁽⁵⁾。」

錢穆對於事務資料整理的疑古、考古派學者，尤深致不滿，以爲割裂穿鑿史事，不能得先民國史之大體，其言云：

「抑思之又思之，斷斷無一國之人，相率鄙棄其一國之史，而其國其族猶可以長存天地之者；亦未有專務於割裂穿鑿，而謂從此可以得我先民國史之大體者⁽⁶⁾。」

既不崇尚割裂穿鑿的枝節性研究，則必然以貫通史事爲治史的最高鵠的，即以撰述通史爲治史之極則。就史學家任務之輕重高下而論，中西學風大都重撰述而輕記注。如章學誠、劉知幾均尊尚撰述通史，其持論較爲人所知⁽⁷⁾；西方史家如沙耳非米尼（

(4) 錢穆：「國史大綱」，引論，頁六，商務印書館。

(5) 全上書，頁七。

(6) 全上書，頁

(7) 章氏嘗自謂：吾於史學，貴其著述成家，不取方圓求備，有同類纂。其持論大旨，具見於「文史通義」釋通、中鄭兩篇。劉氏申言欲繼孔子春秋，綜括舊聞，於司馬遷、班固以下著成新史，自度雖有此才能，惟缺乏自信，卒至無成。見「史通」劉氏自敘。

Jaetana Salvemini) 亦有類似主張，認為：

「只以確定過去支離破碎的事實為限的工作，我們名之曰博學或考據 (Erudition)，依照因果原則，將這些過去的事實組織起來，成為一個系統的學者，我們才稱之為史學家。……博學考據為史家準備磚石，史學家就是建築師⁽⁸⁾。」

故近世以來，欲求貫通史事而有志撰述通史者頗不乏人，梁啟超即有志「大刀濶斧跟著從前大史家的作法，用心做出大部的整個的歷史來」，但梁氏有生之年終未能完成其心願。民初以來，提倡通史最力的是何炳松，何氏史學思想深受美國史家魯賓遜所著「新史學」一書之影響，何於民國十年將該書譯成中文，其書即主張：「歷史為連續而成……為求時間之聯貫，唯通史能表現之」⁽⁹⁾。何氏又據法國史家塞諾被 (

) 所著「應用於社會科學上之歷史研究法」 (La Methode Historique Appliques and Science Socials) 一書而撰成「通史新義」⁽¹⁰⁾，對於通史之定義闡述頗為精當，但何氏終亦未能撰述通史以成一家之言。

按中國史學體裁上之所謂通史，有兩種意義：一是中國固有的「通史」，即與「斷代史」相對而「貫通古今」的「通史」，起源於史記，後世類似的撰作，如隋書經籍志載梁武帝曾撰通史四百八十卷，上起三皇下終五代 (見史通六家篇)。另一種是中西接觸後傳入的「通史」，即與「專史」相對而貫通政治、經濟、社會、學術、宗教等的新「通史」，其體裁係將國史分若干期再分章節敘述。新通史的體裁並非中國所固有，周予同在其「五十年來中國之新史學」文中，認為係由日本間接引入中國，而影響中國史學界較早期較大者，是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和桑原鷺藏的「中等東洋史」兩書⁽¹¹⁾。尤其前者因係以漢文寫成，影響更大，此書出版於一八九一年，東

(8) Historian and Scientist: An Eassy on the Nature of Histor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by Jaetano Salvemini, 周謙冲譯：「史學家與科學家」，頁二至三，商務印書館，民五十一年十一月台北。

(9) 何炳松譯：「新史學」，頁三。

(10) 何炳松著：「通史新義」，自序，頁六，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五十四年台一版。

(11) 桑原鷺藏：「中等東洋史」，出版於一八九八年，有樊炳清譯本，一八九九年由東文學社出版。

京高等師範學校教授南摩綱紀曾爲之撰序，並論「著史有十要」，即：

「一曰詳治亂之原委，國勢之隆替，二曰辨政刑之美惡，教育之盛衰，三曰明地理之形，人種之別，四曰審制度之沿革，五曰記學術之異同，工藝之變遷，六曰分貢舉、銓選之良否，七曰舉兵賦、財政、貨幣之利，八曰析賢愚、淑慝、忠姦、正邪之跡，九曰載農商之勤惰，風俗之醇漓，十曰揭他國交涉之事」⁽¹²⁾。

觀其「十要」內容，通史所欲敘述之材料與義理已大體具備，其後梁啓超亦曾條列中國通史目錄⁽¹³⁾，其內容較詳實而不出「十要」範圍。然新通史雖已略具撰述之準則，有志撰寫且已出版的中國通史爲數亦已不少，但很少能達到理想要求。平心而論，獨立撰作通史確屬艱難的非常事業，何況中國史上猶待研究考證的史事更不少，因此，顧頡剛論當代中國通史之撰述云：

「所有的通史，多屬千篇一律，彼此抄襲。其中較近理想的，有呂思勉白話本國史、中國通史，鄧之誠中華二千年史，陳恭祿中國史，繆鳳林中國通史綱要，張蔭麟中國史綱，錢穆國史大綱等。其中除呂思勉、周谷城、錢穆三四先生的書外，其餘均屬未完之作，錢先生的書最後出而創見最多⁽¹⁴⁾。」

顧頡剛推崇國史大綱「創見最多」，蓋指微言大義而言。顧氏係疑古派大師，錢穆則信古而極力關斥疑古之非。⁽¹⁵⁾疑古派主張古史多經後人層累地造成，錢穆於國史大綱中則闡伏發微，力主「古史實經後人層累地遺失而淘汰⁽¹⁶⁾」，故顧氏之揄揚錢穆應是公允之論。

就史家三長才學識而論，「史所貴者義也，所具者事也，所憑者文也；義存乎識

(12) 轉見自周予同：「五十年來中國之新史學」，見杜維運、陳錦忠合編：「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第三冊又頁三九〇至三九一。

(13) 見梁啓超：「飲冰室全集」，國史研究六種附錄。

(14) 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下編，「近百年中國史學的後期」，頁八五，香港龍門書店，一九七二年九月三版。

(15) 參閱趙鐵寒、王德毅：「二十世紀中國史學的發展」，見二十世紀之科學，第九輯，人文科學之部：史學，頁二八三，中書局出版。

(16) 國史大綱，頁四至五。

，事存乎學，文存乎才；非識無以斷其義，非學無以練其事，非才無以善其文⁽¹⁷⁾」，則微言大義當存乎「識」。錢穆自述其撰作之過程時，以為通史創作之難，「非委悉周備之難，而簡要明當之尤難也」。因為二十五史、十通以及充棟塞屋的書籍具在，學者只要昕夕鑽研，自能「委悉周備」，而欲求簡要明當，「則於繁重之國史，必先有所取捨，又必先有一系統之觀點，以為取捨之標準，必先立一體，乃能有所取裁，凡所載之寬狹長短，一視與具體之相副相稱以為度⁽¹⁸⁾。」由此可知，錢穆的史識表現於國史大綱者，是「有一系統之觀點，以為取捨之標準」，亦即章學誠所讚譽的「別識心裁」。錢穆嘗論新通史之創作，須簡單扼要而又必須具備兩條件，事實上即其國史大綱所遵循的系統觀點，錢穆云：

「今日所需要之國史新本，將為自尚書以來下至通志一類之一種新通史，此通史應簡單而扼要，而又必具備兩條件。一者必能將我國家民族已往文化演進之真象明白示人，為一般有志認識中國已往政治社會文化思想種種演變者所必要之智識。二者應能於舊史統貫中映照出現中國種種複雜難解問題，為一般有志革新現實者所具備之參考。前者在積極的求出國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泉源，為全部歷史所由推動之精神仰寄；後者在消極的指出國家民族最近病痛之證候，為改進當前之方案所本⁽¹⁹⁾。」

因此，錢穆的史識一系統的觀點，足以使他成為前述沙耳非朱尼所稱許的「一個有系統的史學家」，而國史大綱乃於敘述中兼有議論，且多深中肯綮的精闢之論。近人牟潤孫評之曰：

「錢氏懷愛國之熱忱，於我國文化之構成發揚遞嬗諸端，闡述最為詳明，舉凡歷史上重大事件，如統一、分裂、強盛、衰亡等，錢氏悉能掌握其原因、結果、發展線索，予以清楚敘述。蓋其所重者在政治、經濟、制度、學術、文化、社會、民族各方面，而非徒如前人之拘牽於朝代帝室之興衰⁽²⁰⁾。」

(17) 何炳松：「歷史研究法」，頁八十。

(18) 「國史大綱」，書成自記，頁一。

(19) 全上書，引論，頁七。

(20) 牟潤孫：「記所見之二十五年來史學著作」，原載「思想與時代」第一一六至一一八期，轉見自「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第二冊，頁一一二二。

其次，前述錢穆所謂「委悉周備」，亦即宏博的「史學」，大致而言，國史大綱取材極為宏富，書中採擇引述的史料多達數百種，但全以經書古籍為主，顯見其經學史學造詣之精湛，而不脫「以經證古」的傳統學風。甚至疑古派學者所鄙棄不顧的古籍如山海經、竹書紀年、楚辭、天問、世本、管子等書，錢氏均信而不疑，以為「盡可參證聯貫」⁽²¹⁾。對於當代中外學者研究之成果，除殷墟卜辭外，絕無採錄引用，雖瑕不掩瑜，而仍有美中不足之憾。

再就史才而論，錢氏云「必先立一體，乃能有所取裁」。然「國史大綱」本由北大中國通史講義增刪而成，全書凡八編四十六章，每一章即一完整的主題，均經仔細思量斟酌而後定（書成自記），標題之後，大書以提要者類如綱，分注以備言者類如目，故其敘述之體裁與綱鑑輯覽或綱鑑易知錄無異，讀之難免繁瑣枯燥。錢氏述其著作之動機，認為「欲其國民對國家有深厚之愛情，必先使其國民對國家已往歷史有深厚的認識」（引論），若以此崇高之目的求之文字高古而體例近綱鑑的「國史大綱」，誠恐曲高和寡，難引起國人共鳴。故呂思勉有鑒於此，乃以豐富的史識與流暢的筆調來寫通史，方為通史寫作開一新的紀元⁽²²⁾。其後張蔭麟亦欲以簡潔的筆調，集數人的力量寫一通俗的通史，不加腳注，不引原文，使有井水處人人皆熟於史事，惜乎張氏英年早逝，壯志未酬⁽²³⁾。

由上述觀之，錢穆「國史大綱」所以為國史名作，並非以其豐富之史學與綱鑑式體裁傲視群倫，實由於其史識明達，批判史事多石破天驚之論。故此下擬對錢氏之史識作進一步詳析介紹。

三、呼應時代的民族主義史觀

傳統中國的史學，千古以來一直是維繫民族與文化穩定發展的中堅，同時也教化並安慰中國人昂首濶步於天地之間。但自民初新史學發展以來，科學派（即錢穆所謂的考訂派史家）承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之潮流而起，大舉對古文經進行總攻擊，連帶

(21) 「國史大綱」，頁一六。

(22) 顧頡剛，前引書，頁八五。

(23) 顧頡剛，前引書，頁八五至八六。

又懷疑古史傳說的真實性。由於過分的疑古，「不僅使三千年來的文化遺產爲之蕩然，而且社會人心所維護的無形力量也式微了⁽²⁴⁾」，影響所及，在中國人的土地上，只存在來自西方的意識形態，給中國人帶來的是「四顧茫然，不知所措」⁽²⁵⁾，而學術界更「失去了安中國人之身，立中國人之命的學問，成爲外來意識形態下的夢遊患者⁽²⁶⁾」。當時學者對此疑古旋風起而批評的亦不乏其人，如梁啓超評論「中國哲學史大綱」時說：

「疑古不失爲治學的一種方法，但太過也很易出生毛病，諸君細讀此書，可以看出他一種自定的規律，凡是他所懷疑的書都不徵引，所以不惟排斥左傳周禮，連尚書也一句不提，殊不知古代，若連尚書左傳都一筆勾銷，簡直把祖宗遺產蕩失一大半，我以爲總不是學者應採的態度⁽²⁷⁾。」

梁氏之論是從學術研究的客觀態度而發，是純粹理性的。此外，基於近代民族主義之體認⁽²⁸⁾，將個人的一切活動歸之於國家民族的利益之下，而以國家民族的利害作爲個人活動的指標，並且在意識上與其國族與文化結合爲一，因而對疑古學風大加駁斥的是被稱爲信古派的章太炎與錢穆。章氏提倡「歷史民族主義」，主張歷史乃民族構成之要素，歷史毀則其國必亡；而民族主義之發生，須賴史籍所載人物制度地理風俗之類爲之灌溉⁽²⁹⁾。此種理論並成爲推翻滿清完成民族革命的思想利器。故章氏晚年講學吳門之際，雖與政治絕緣，但鑒於外患日亟，國本動搖，而史學界猶高倡疑古之說，厚誣國史，因此常以「尊信國史，保全中國語言文字」誡其弟子，並指斥疑古學

(24) 全註十五，頁三三〇。

(25) 參閱董作賓：「中國古代文化的認識」。

(26) 毛鐸倫：「評中共史學的發展與演變」，時報，六十九年三月二日。

(27) 參閱「梁任公學術演講集」第一輯。

(28) 有關近代民族主義思想，參閱李國祁：「中國近代民族思想」，收於「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一民族主義」，時報出版公司六十九年出版。又李思涵：「清季民族主義」，見李恩涵、張朋園等著：「近代中國一知識分子與自強運動」，食貨史學叢書。又 Boyd C. Shafer, *Nationalism, Myth and Reality*, pp.3-11, New York, 1955.

(29) 參閱吳蔚若：「章太炎之民族主義史學」，見大陸雜誌第十三卷第六期。

風云：

「民國以來，其學（公羊之學）雖衰，而疑古之說代之，謂堯舜禹湯皆儒家僞托，如此惑失本原，必將維繫民族之國史全部推翻，國亡之後，人人忘其本來，永無復興之望⁽³⁰⁾。」

章氏基於「歷史毀則其國必亡」的觀念，因而提倡讀史，相信國史，以孕育民族思想。故凡有害於國史之神聖莊嚴者，均大加駁斥，初不僅指斥疑古派而已，即地下史料如甲骨文亦作「理惑篇」以關斥之⁽³¹⁾。錢穆亦主張熟知歷史始能真愛國家，所謂「欲其國民對國家有深厚之愛情，必先使其國民對國家已往歷史有深厚的認識。欲其國民對國家當前有真實之改進，必先使其國民對國家已往歷史有真實之了解」（引論），蓋與章氏提倡讀史之觀念無殊。錢氏之相信國史，排斥疑古，亦與章氏社民族主義思想同調，嘗鄙斥疑古派謂：

「考訂派（即科學的疑古派）則震於科學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實，為局部窄狹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換為史的材料。治史譬如治岩礦、治電力，既無以見前人整段之活動，亦於先民文化精神，漠然無所用其情。彼惟尚實證，夸創獲，號客觀，既無意於成體之全史，亦不論自己民族國家之文化成績也⁽³²⁾。」

錢穆即本著對國史的熱情，對民族文化的懷念，不滿疑古學風對古史的妄加鄙辱，所以起而抗辯。因此，錢穆在當時學術環境裡，其信古的精神被認為是保守的、傳統的，而與章太炎並列為信古派。惟錢穆雖斥疑古為繆說，但並不排斥地下史料，反能利用地下史料以成就其信古之說。如錢氏因主國維之「殷卜辭中所見先王、先公、考」及「續考」而推證殷人出自帝嚳之說，謂史記股本紀、世本、山海經、左傳、魯語、皇甫謐、帝王世紀種種傳說皆可參證連貫，均因卜辭之發現而重新估定此等書籍在古代史料上的價值。因而主張中國古代書籍記載，不僅如史記等見稱為謹嚴之史書者有其可信之價值，即素目為荒誕不經之書如山海經等，其中亦有可信之史料。對於近人

(30) 諸祖耿：「記本師章公自述治學之功夫及志向」，見制言第廿五期。

(31) 章炳麟「理惑篇」，見「國故論衡」上。

(32) 「國史大綱」，引論，頁三。

所謂除直接發見之物證外，上古流傳之文字記載皆不可信，則直斥爲：「豈不顛倒之甚！」⁽³³⁾

由於信古，自然即表現對古史的崇敬，甚至是近於宗教性的諒解和崇拜，錢氏論國史之研究謂：

「近代的中國人，偏喜用惡意來解釋中國史，如說堯舜禹湯文武所謂古代聖人盡出後人偽造即是一例。但我們縱說這些是後人偽造，亦足證明偽造此一派古代聖人的種種故事的人，豈不在希望這一部中國歷史能成爲一部善的歷史嗎？後代人永遠信受此偽造，亦見後人也都希望這一部中國歷史能成爲一部善的歷史了。生於其心，自可見於其政，則此下的中國史自不當專心以惡意來解釋⁽³⁴⁾。」

錢氏基於這種宗教式的崇古心理，因此對國史往往從善的一面去觀摩，而「附隨一種對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³⁵⁾，這是他撰寫「國史大綱」的主要意識形態，所以書中不時流露出對歷史精神文化的歌頌讚美。例如論中國學術思想，則認爲先秦時代所奠定的基礎是「所由形成中國之文化，搏成中國之民族，創建中國之政治制度，對內對外造成此偉大崇高之中國國家，以領導東亞大地數千年之文化進程」⁽³⁶⁾。論秦代廢封建行郡縣，則爲張「郡採天下爲一家，可望永久和平，封建則依然列國并立，難免兵端，此實當時一種極純潔偉大之理想，所謂平天下是也」⁽³⁷⁾。論政治制度，則認爲「中國政治自秦漢以下，本有一種理性之指導，法度紀綱粗建，無豪強之兼併，無世胄僧侶之專政，教育、選舉、考試與統治權常明密切之聯繫，不斷吸收社會優秀份子公開參政，使其新陳代謝，政府與民衆即以此爲連鎖，舊朝以積久腐敗而傾覆，則新朝鼎革，去其泰甚，與民更始」⁽³⁸⁾。諸如此類讚譽備至的敘說，真不勝枚舉，充分顯示對國史民族主義式的溫情與敬意。

(33) 全上書，頁十六。

(34) 錢穆：「中國歷史研究法」。

(35) 錢穆：「國史大綱」，凡讀本書請先具下列諸信念。

(36) 全上書，頁八三至八四。

(37) 全上書，頁八五。

(38) 全上書，頁二八六至二八七。

錢穆由於信古崇古而關斥疑古派，其持論則頗為精闢新穎，足以服人。故「國史大綱」上古部份創見獨多，要之皆以創建新古史觀維護其信古說為主，對近人極端之懷疑論予以有力辯正。如駁斥疑古派「古史若經後人層累地造成」之說，而別倡「古史乃經後人層累地遺失而淘汰」之論。如探討黃帝時之疆域而予以新解釋，辯正黃帝非神話虛構⁽³⁹⁾。又據上古之國際關係，推論三代綿延之歷史與文化程度已極進步發達⁽⁴⁰⁾。又如辯正秦代中央集權非君權專制獨伸，認為「秦廷有集議之制，為兩漢所承，朝廷每逢大事，君臣集議，猶與春秋列國貴族世卿之世略似，就此種政制風格言之，亦非一君權專制獨伸之象」⁽⁴¹⁾。類此護古衛古之論亦不勝枚舉，足見錢氏堅定認同歷史文化的民族意識。

若就民族主義的意義而論，章太炎基於革命排滿的現實需要，主要是採取種族的觀點⁽⁴²⁾，雖然亦有撰述中國通史計劃，卒未有成⁽⁴³⁾，故其民族思想實以排滿的種族主義為主。種族主義的民族思想，是不同種族之間鬥爭時最直接的心理反映，也是古今中外民族主義最原始的一種型態，其本質是狹隘的。錢穆的民族主義史觀則排斥種族觀念，而強調文化本位的民族觀，故錢氏論春秋時的華夷雜處之局，主張「所謂諸夏無戎狄，其實只是文化上的一種界線」，又說：

「春秋時期群目楚人為蠻夷，以楚主武力兼併最烈，與諸夏宗法封建勢力根本相衝突也。及戰國中期以後，群目秦人為夷狄，而再不見斥楚為蠻夷者，因其時抱兼併野心者乃秦，而楚人則久與東方諸國聯盟一體也。可見當時所指斥為夷翟者，並非就種族血統立說⁽⁴⁴⁾。」

因此，錢氏認為，中國人的民族觀念常包含極深厚的文化意義，凡能接受中國文化的

(39) 全上書，頁六。

(40) 全上書，頁二十二。

(41) 全上書，頁八五至八六。

(42) 參閱小野川秀美著，李永熾譯：「章炳麟的排滿思想」，大陸雜誌第四四卷第三期。

(43) 吳蔚若：「章太炎的民族主義史學」，前引書，章氏所撰「尙書」中，有中國通史敘錄一篇，雖未及撰述，而已先創義例。

(44) 「國史大綱」，頁五十。

，中國人常願一視同仁，胞與爲懷，無偏狹的、侵略的國家主義，而採取文化的、和平的世界主義。這種文化民族主義對中國歷史發展的動向具有深遠的影響，錢氏即充分掌握此種動向，而對先秦民族之融合及魏晉南北朝胡人之漢化，以及遼、金、元之建立政權，均能闡發其文化本位的民族觀。尤其對於明末遺老之志節，在清朝異族政權統治下所造成的矛盾現象作了有力的辯解，其言謂：

「民族文化正統的承續者，操在讀書人的手裡，而讀書人所以能盡此職責，則因其有政治上的出路……若使讀書人反對科舉，拒絕仕宦，與上層政權公開不合作，則失卻其經濟的背景，非躬耕爲農，即入市爲商，而從此他們亦再不能盡其負荷民族傳統文化之職責。所以一個士大夫的家庭，要想負荷民族傳統文化之職責，只有出身仕宦。明末的遺民，雖則抱有極強烈的民族觀念，到底除卻他們自身以外，他們的親戚朋友以至他們的子孫，依然只能應舉做官，這樣便是與異族政權的妥協，惟有如此，他們還可負荷他們最重視的民族文化^(44')。」

由此可以看出，錢氏強烈認同文化尤甚於種族的民族思想。唯其如此，中國傳統民族的盛衰興亡，及與異民族的衝突融合，始能予以較完美的解釋。

錢氏信古崇古而又積極護古衛古的民族意識，在當時疑古旋風震撼和內憂外患日亟的時代，確能反映史學與世變的密切關係。同時，國史大綱出版於民國廿九年六月，正是日寇暴虐，國本動搖之際，當時學者大都表現強烈的民族意識，如陳寅恪在馮友蘭著「中國哲學史」審查報告中，即主張學術應「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⁴⁵⁾。馮友蘭在七七事變之後，思想論調亦漸起變化，而接受或接近陳寅恪的見解⁽⁴⁶⁾。故錢氏的民族主義史觀確與時代相呼應，故深得時人讚譽，牟潤孫對此有深刻之評論云：

「錢氏此書中愛國家、愛民族思想洋溢滿紙，於世之持自卑自賤之論者，痛加針砭，立論極足使人感動。吾人今日遊地海外，形勢之惡劣，較諸三十餘年前數十過之。讀錢氏之書，當使懦夫有立志，病夫有生氣，熱血沸騰，奮然而思有以自

(44') 「國史大綱」，頁六一一—至六一二。

(45) 陳寅恪，馮著中國哲學史「審查報告三」，頁四，轉見自周予同：「五千年來中國之新史學」，前引書，頁四一一。

(46) 全上書，頁四一〇至四一一。

存矣。此爲讀史之大用，亦卽史學家所貢獻於世者也⁽⁴⁷⁾。」

不過，民族主義常帶有濃厚的感情，甚至變成「無理由之宗教」⁽⁴⁸⁾。錢氏的民族主義史觀既應世變而發，其情感是無法排除的，周予同曾將信古與疑古兩派治史之精神作一比較，可以看出錢氏民族主義史觀的特色，略謂：

「錢氏站在『通史致用』的觀點，要求治史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其出發點是情感的，公民的。考古派站在『考史明辨』的觀點，希望治史者抱一種『無徵不信』的客觀態度，其出發點是理智的，學究的⁽⁴⁹⁾。」由此可知，錢氏「通史致用」的觀點，乃是要實現「史學經世」的理想，而這種觀點與理想與整個時代是相互呼應的。疑古（考古）派學者類如德國十九世紀史學大師蘭克，其治史態度均盡力摒除現代人的感情，不讓現代人的偏見、感情影響或滲入歷史研究⁽⁵⁰⁾。但蘭克的部份學生因受到普魯士政治統一運動的時代衝擊，不得不背離蘭克學派所謂「政治超然」與「科學歷史」的傳統，而轉向經世致用的史學，此即普魯士學派。此派學者藉歷史以傳播德意志的民族文化，歌頌普魯士王室的輝煌政績，將德意志社會的意識型態改變爲有利於普魯士的政治統一⁽⁵¹⁾。因此，錢氏「通史致用」的觀點與普魯士學派的經世致用思想實無二致，以當時中國的內外處境而論，藉史學教育重建國人的信心，指引國家奮鬥的目標，一如普魯士學派對德國統一大業所做的努力一樣，錢氏的史觀是值得推崇諒解的。梁啟超曾說：「史學者乃愛國心之源泉也，今日歐洲民族主義所以發達，列國所以日進文明，史學之功，居其半焉⁽⁵¹⁾。」就此而論，國史大綱的價值是可以肯定無疑的。

綜上所述，錢氏鑒於疑古旋風「惑失本原」，乃基於民族意識而予以駁斥，與章太炎同列信古派之流。錢氏並因信古崇古而積極創新古史以護古衛古，並以文化本位

(47) 牟潤孫：「記所見廿五年來史學著作」，見杜維運等編「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第三冊，頁一一二三。

(48) 語出「楊度復梁啟超書」，見丁文江編「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頁二三七。

(49) 蔡石山：「西洋史學史」，頁一七七。

(50) 全上書，頁一七七至一八三。

(51) 梁啟超：「新史學」，「飲冰室全集」卷卅四。

的民族主義建立其史觀，作為經世致用之媒介。其說雖不免流於感情化與主觀傾向，但其「竊取之義」實值得吾人讀許諒解，其書之價值至此尤見輝煌。

四、繼往開來的經世致用史學

近世以來，主張經世致用史學的學者首推梁啟超，梁氏論「新史學」應擴大「為今務」，使「今世之人鑑之，裁之，以為經世之用」⁽⁵²⁾。但史學欲為經世之用，不可「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梁氏所謂「理想」，即「史事解釋」，蓋「知其以若彼之因，故生若此之果，鑑既往之大例，示將來之風潮，然後其書乃有益於世界」⁽⁵³⁾。然而民初以來，在以科學整理國故的風潮下，學者事務於枝節性的考證，而忽略了義理的時代性意義，這是新史學發展的一大缺憾。故周予同論新史學謂：

「胡適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中提出治史的三個目的：明變、求因、批判。但疑古派與考古派究竟多只做到明變的一部份工作，而沒有達到求因與批判兩個目的。因此疑古派與考古派只敘說歷史現象之如此，而沒有深究歷史之所以如此。換言之，只是歷史之現象論，而非歷史的動力論」⁽⁵⁴⁾。」

在治史學者中有鑒及此，並且積極尋繹出歷史動力論者，首推錢氏及其「國史大綱」，錢氏在引論中謂：

「惟藉過去乃可認識現在，亦惟對現在有真實之認識，乃能對現在有真實之改進。故所貴於歷史智識者，又不僅於鑒古而知今，乃將為未來精神盡其一部分孕育與嚮導之責。」（引論頁二）

因此，錢氏推論新通史之作應具兩個條件，即前述系統的觀點：一是積極的求出國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泉源，為全部歷史所由推動之精神所寄；一是消極的指出國家民族最近病痛之證候，為改進當前之方案所本（引論頁七）。

就第一個條件而言，國家民族生命之泉源及推動歷史之精神，向為傳統史家所忽略或誣解。故梁啟超曾慨嘆：「從來作史者，皆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曾無一書為

(52) 全上書，頁廿七。

(53) 全上書，頁廿八。

(54) 周予同：「五十年來中國之新史學」，「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第二冊，頁四〇七至四〇八。

國民而作者也」⁽⁵⁵⁾，因此，當代中國史學家所應努力創作的歷史，不是供政治家閱讀的資治通鑑，而是供全體國民活動的借鏡。錢氏國史大綱即基於此種認識，而積極發揚歷史精神，表現出極為濃厚的人道主義與民本思想。例如論政治、經濟方面云：

「秦代政治的失敗，最主要的在其役使民力之逾量。」（「國史大綱」頁八六）
 「王莽失敗後，變法禪賢的政治理論從此消失，漸變為帝王萬世一統的思想，政治只求保王室之安全，亦絕少注意到一般的平民生活。這不是王莽個人的失敗，是中國史演進過程中的一個大失敗。」（「國史大綱」頁一〇八）

又云：

「晉武以開國之君，對民衆絕無絲毫善意與德政，戶調稅收，依然與屯田兵一律，只想憑王室威嚴，向其下強奪豪取，豈能有成，晉室不永，只此等處可見。」（「國史大綱」頁二三〇）

論及社會經濟方面則云：

「自行均田而農民始有樂生之意，自行府兵而農民始無迫死之感，必待下層農民稍有人生意味而後世運可轉。隋唐之興，大體即建基於均田，府兵的兩個柱石上。」（「國史大綱」頁二四六）

論及學術思想則云：

「儒墨兩派有他們共同的精神，他們全是站在全人類的立場來批評和反對他們的貴族生活。」（「國史大綱」頁七一）

上述所引，不過如大海之數瓢而已，全書隨處均可見此種精神之發抒流露，頗有「得民者昌，失民者亡」之遺義。

其次，錢氏在尋繹國家民族生命泉源及推動歷史文化的精神方面，具有濃厚的理想主義的文治思想。認為傳統的中國社會，能把握時代力量的是士大夫，而國家本是精神的產物，故政治之隆污，繫於士大夫人心之振靡。錢氏又認為一個政權的生命，必須依賴於某一種理論之支撐，此種理論即是正義。正義授與政權以光明，而後此政權可以綿延不倒，否則政權將為一種黑暗的勢力，黑暗根本無法存在，必趨消失⁽⁵⁶⁾

(55) 全註五十一，頁三。

(56) 錢穆：「國史大綱」，頁一五四。

。而士大夫即是維繫此正義的主要力量，因此，士大夫實繫天下之休戚安危。如錢氏論漢代政治，謂漢武帝相公孫宏，以布衣儒術封侯拜相，使漢初代表平民社會的素樸的農民政府，轉變為平民社會有教育有智識的士人政府，這是當時的一大進步⁽⁵⁷⁾。論魏晉南北朝政治，則謂南方自東晉以至五胡，歷代王室對士族逐步加以輕蔑裁抑，南方士族終於消沉；北方自五胡迄元魏齊周，歷代王室對士族逐步加以援用重視，北方士族終於掌握北方政治的中心勢力，而開隋唐之復盛⁽⁵⁸⁾。論唐代士風與政治之關係，認為自開元以後，進士科特重詩賦，全國上下尚文之風日盛而尚實之意日衰，因此唐代政治界之風習，大有從北朝經術轉向南朝文學的意味，這是唐代盛運中衰微之一⁽⁵⁹⁾。宋代王室因渴望文治勢力助成其統治，故一面放寬進士出路，一面提高文官待遇，終至有一輩以天下為己任的秀才，帶著宗教性的熱忱，要求對此現實世界大展抱負，於是上下呼應而激成變法運動⁽⁶⁰⁾。元代因種族歧視，不能任用漢人南人中的優秀份子，因此政治上缺乏理想，不知政治的責任所在，終至國亂而亡⁽⁶¹⁾。明代政治惡化之主因，在於太祖以後不惜用嚴刑酷罰對待士大夫，使士人震懾於王室積威之下，鞭苔捶楚，成為朝廷士大夫尋常之辱，於是政治只有走上歧途⁽⁶²⁾。清代雖獎勵學術，推尊朱子，但實不願學者認真効法程朱而與聞其政權，學者又多震於文字獄之慘烈，於是相率遁入故紙堆中而與現實脫離，其應科舉仕宦的，全只為功名利祿，而無絲毫以天下為己任的觀念，清代中葉的學術日盛而吏治日壞，其原因在此⁽⁶³⁾。

因此，錢氏認為，宋明以來的社會與隋唐以前不同，世族門第消滅，社會間日趨於平等而散漫無組織，一切公共事業，均須有主持領導之人。若讀書人不管社會事，專務應科舉做官謀身家之富貴，則政治社會事業勢必日趨腐敗。其所以猶能支撐造成

(57) 全上書，頁一〇三至一〇五。

(58) 全上書，頁二二一。

(59) 全上書，頁三一—至三一二。

(60) 全上書，頁三七七至三九九。

(61) 全上書，頁四五九。

(62) 全上書，頁四七六至四七八。

(63) 全上書，頁五一九至六二〇。

小康之局者，正唯賴此輩講學之人來做中堅。至此，錢氏已把國家生命之泉源與推進歷史文化之動力表露無遺。

再就第二個條件而言，魯賓遜在他的「新史學」中，即主張「史學之目的在瞭解自身，解決當前問題，甚至於探測將來。」又說：「歷史須賦現在以意義，史事須視作一進進不已之發展，據此發展而後能洞察現在⁽⁶⁴⁾。」因此，為使史學能成為一般有志革新者之參考，則必須自歷史演進中探索國家民族之生力與病態。生力即指國家民族歷史所由推進之動力，病態即具歷史演進途中所時時不免遭遇之頓挫與波折⁽⁶⁵⁾。而生力與病態必須運用公正無私的精神，在客觀的史實中求實證，予史事以價值判斷，正如王船山所謂：

「所貴乎史者，繼往以為來者師也，為史者記載徒繁，而經世之大略不著，後人欲其得失之樞機以效法之，無繇也，則惡用史為？」⁽⁶⁶⁾

顧頡剛謂錢氏創見最多，蓋指史識之明體達用而言，錢氏之評斷史事得失，亦見其史學宏博，史法練達。如比較兩漢之國力，認為西漢立國姿態常是協調的、動的、進取的，故國力強；東漢立國姿態則為偏枯的、靜的、退守的，故國力弱⁽⁶⁷⁾。又如將宋明儒者與先秦諸子比較，指出先秦諸子雖則異說爭鳴，但並未實際把握政權，因此在學術上愈推衍愈深細博大；各家亦各自完成其精神面目。北宋諸儒則同時並列朝廷，其學術意見未能發展至深細博大處，而在實際政治上便發生起衝突⁽⁶⁸⁾。又分析秦以後之政治環境，認為中國人對於政治意義之認識，已不許有貴族世襲封建制度之存在⁽⁶⁹⁾。其分析元明以來行省制度之流弊尤見精闢，略謂明季流寇不能速平，與分省制度之不當有關，蓋地無常界，兵無常將，而藩鎮控制之宜盡失。元明清三代川楚粵之亂皆坐此弊，中央雖無藩鎮專制之憂，而不能禁亂民突起之禍。甚至辛亥以後，

(64) 參閱汪榮祖：「梁啟超新史學試論」，見「中國史學史論文集」第二冊，頁九五九。

(65) 「國史大綱」，引論，頁二十二。

(66) 王船山：「讀通鑑論」，四部備要船山遺書，中華書局校刊本卷六，頁十二A。

(67) 「國史大綱」，頁一三九至一四〇。

(68) 全上書，頁四二八。

(69) 全上書，頁八二至八三。

各省軍權割據離析，遠則導源於元明以來行省制度之流弊⁽⁷⁰⁾。錢氏又以綜合歸納方法統論國史發展之得失利弊，例如論述秦漢所以強盛，係由於黃河西部武力與東部經濟文化相凝合而造成，但東漢以來，東方人漸漸忘棄西方，西方得不到東方經濟文化之潤澤而衰落；而東方的文化經濟亦為西方武力所破壞。因此，錢氏結論認為，一個國家內部自身，存在兩種極相違異的社會情況，無有不致大亂者⁽⁷¹⁾。故錢氏對於魏文帝南遷後，鮮卑貴族盡是錦衣玉食，沈醉在漢化的綺夢中，而留戍北邊的卻形成奴隸，貴賤遽分，終至演成邊鎮爾朱榮之亂，認為「此乃代表鮮卑遺留在北方之舊傳統舊勢力，與洛陽漢化後之新朝貴絕不相同，一個國家同時擺著兩個絕不相同的社會，勢必釀亂。」⁽⁷²⁾此外，錢氏藉綜合國史提出針砭借鑒者亦不少，如論變法改革，謂：

「凡歷史上有一番改革，往往有一度反動，不能因反動而歸咎改進之本身。然亦須在改進中能善處反動方妙。魏孝文卒後，鮮卑並不能繼續改進，並急速腐化，豈得以將來之反動追難孝文。」⁽⁷³⁾

類此之說充塞於篇章，其警世作用自有深意，正符其「指出國家民族病痛之證候，為改進當前之方案所本」宗旨。

綜合上述，可知新史學的發展，係以經世致用為最高鵠的，錢氏即以通史致用為其撰述目標。因此，在探討國家民族永久的生命泉源方面，錢氏指出了人道主義與民本思想為歷史主流；在推動歷史精神的進化方面，錢氏則因理想的文治政府的體認，而指出士大夫人心之振靡及其與統治者間的適應關係，實為推動歷史之關鍵。此外，錢氏也綜論國史發展，利用比較、分析、歸納等方法，指出國家民族病痛之證候，作為當前改進方案所本。就此而論，本書之經世致用，不僅在鑒古知今而已，更為將來精神盡其孕育與嚮導之責。

(70) 全上書，頁五九二及六五四。

(71) 全上書，頁一五一。

(72) 全上書，頁二〇五至二〇六。

(73) 全上書，頁二〇六。

五、結 論

民國以來，新史學在急劇的世變中應時而興，造成史學界觀念的革新與方法的突破。但學者大都昧於科學主義之美名而從事枝節性的疑古考古研究，對於「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通史創作，或漠然忽視，或心有餘而力不足；致通史之體例雖已燦然具備，而作品則寥若晨星。即有少數倡導者與撰述家，其著作亦多屬千篇一律，乏善可陳，唯獨錢穆所撰「國史大綱」成就較著，為士林所重。雖然錢書中廣博宏富的史學仍不脫以經證史的階段，其史法體裁亦略如綱鑑而繁瑣枯燥；但其明體達用之史識則創見最多，為史學造詣精湛之所在。

錢氏的史識源於他對國史無限的溫情與敬意，以及對時代深切的體認與關懷。因此，對於所謂「惑失本原」的疑古學風，起而予以有力的駁斥矯正，而與章太炎同列信古派之流。惟錢氏於書中除表現強烈的信古崇古精神外，更以近乎宗教性的虔誠與熱情積極重建國史新說，以達到其護古衛古之目的；並以文化本位的民族觀建立其歷史解釋系統，充分顯示其民族主義史學之特徵。當此之際，日寇暴虐橫行，舉國滔滔正面臨內憂外患之交相侵逼，學者專家亦多以民族主義相尚。錢氏於此時揭舉民族主義之大纛，藉史學以經世致用，使「國史大綱」與時代世變相呼應，其別識心裁與竊取之義，實值得吾人讚譽諒解，其書之價值，於此等處更見其珍貴。

錢氏因新史學之發展以經世致用為最高鵠的，故「國史大綱」即以發揚歷史精神並闡明政治得失為撰述目標，而以繼往開來為通史致用之目的。因此，錢氏指出國史精神中的人道主義與民本思想為國家民族永久的生命泉源；又基於理想的文治政府之體認，指出士大夫與統治者間的適應關係及其人心之振靡，實為推動歷史之關鍵。錢氏又以其豐富之史學與明達的史識，透過比較、分析、綜合、歸納等歷史解釋，闡明政治的利弊得失，指出國家民族病痛之證候，並提出針砭矯治之道，作為當前改進之借鑒。故「國史大綱」之經世意義，不僅在鑒古知今而已，更積極為將來精神盡其孕育嚮導之責。

綜括言之，十九世紀以來民族主義早已成為推動人類歷史的主流之一，並且是導引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主要動力。所以錢氏以民族主義史觀撰寫「國史大綱」，可說

已掌握到時代精神的動向，不僅因此得以安慰在苦難和失望中忍受煎熬的中國人，而且鼓舞中國人再接再厲的信心和勇氣，這是「國史大綱」成功之所在，也是錢氏史識明達之表現。